

科举神的流转与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

胡海义

【摘要】梓潼帝君原本只是蜀中举子信奉的科举神，在南宋时期流寓至杭州，通过朝廷与京城举子的影响，最终确立了国家科举神的地位。但这位流寓神在杭州的地位并不长久稳固，在明代被诞生在西湖畔的本土进士于谦取代。西湖小说不仅在于谦成为科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使用援关帝、黜文昌的策略来扩大于谦的影响力。科举神在西湖畔的流转沉浮彰显出西湖小说浓郁的地域色彩。从科举风俗的变迁来看，西湖小说对文学地理研究具有较高的地域文献价值、研究方法价值和景观研究价值。这些对弥补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不足具有较大的意义。

【关键词】科举神；西湖小说；于谦；文学地理；研究价值

德国哲学家康德 1757 年在《自然地理学》中最早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中国学术史上，梁启超于 1902 年首次使用“文学地理”的概念^①。此后，学界出现了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元剧之时地》（1915）、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1937）等颇具价值的文学地理研究成果。1980 年代以来，文学地理研究在沉寂了 30 年后又逐渐复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就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而言，则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是忽视文学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互动的辩证关系，文学地理研究不仅要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应关注文学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所有的这些影响都可能体现为某些共性，隐含某些规律，但是近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大都注重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略，因此，这种研究仍然不免是单向的，或者说是片面的”^②。

二是地域小说文献不足，相关研究缺失。作为古代文学正宗的诗文蔚为大观，许多诗文流派以地域命名，如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湖湘诗派等等，文学地理研究也历来聚焦诗文。如《诗经》的“国风”按地域分类，“风土之音”研究备受关注。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论及文学与“山林皋壤”的关系，提出了“江山之助”的命题。朱熹的《诗集传》大量“以地证诗”等等，都属于诗文中文学地理研究的典范。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本应更能全面、鲜活地反映风土人情和地域风貌，但相关文献和研究被视为相对不足、缺失^③。

这些问题在西湖小说中能得到较好地解决。“西湖小说”一词最早为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1594—1657）提出，他在《北游录》中说：“（顺治十一年七月）壬辰，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④《北游录》主要记录了京师的地理、景观、气候、民生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研究价值。此处的西湖小说是指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一集》和《西湖二集》。其他以杭州西湖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且出现西湖场景的小说，如宋元的《西湖三塔记》，明清的《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等都可视为西湖小说。西湖小说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在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就文学地理研究而言，它在古代小说中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学界开始重提西湖小说^⑤。本文通过梳理颇具地域特色的科举神的流转，来考察西湖小说对文学地理研究的价值。

梓潼帝君：蜀地“流寓神”的杭州情缘

作者简介：胡海义，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股文与明清小说相互关系研究”（12CZW03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项目。

科举应试带有难以预料的偶然性与未定因素，世人于是产生了“科名前定”的宿命观念。科名主于神，举子们亟需造出一位科举神来膜拜祈福，文昌梓潼帝君应运而生。其是文昌与梓潼二神的合称，有时用全名，有时简称为文昌帝君或梓潼帝君。文昌原是古星官名，是魁星（斗魁）之上六星的总称。梓潼则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县（今属绵阳市）的名称，因境内有潼江，江边多梓树而得名。梓潼神即梓潼县的一个地方神，其庙在县城以北的七曲山。梓潼神又附着一个四川人的传说，即越西（今四川西昌一带）氏人张亚子因报仇杀人，举家逃至梓潼七曲山避难，死后为神^⑥。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唐玄宗、僖宗曾仓皇逃蜀，先后封张亚子为左丞与济顺王。梓潼神由一个蜀中偏远的地方小神成为皇家守护神，但和科举无涉。祝尚书先生通过分析涵芬楼校本《说郛》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等材料认为，徽宗时道教盛行促使梓潼神成为科举神。七曲山位于北宋四川举子赴开封参加省试必经的古金马道上，举子们因此顺路向梓潼神乞求功名^⑦。

梓潼神在北宋还只是蜀中举子信奉的科举神。到了南宋，他流寓至杭州，通过朝廷与京城举子的影响，最终确立了国家科举神的地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李知几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几。是举过省。”^⑧李知几是四川资州人，浙江人陆游有过入蜀经历，可见江浙士人对四川举子祈梦梓潼神已感兴趣。宋孝宗时期，道教徒杜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说法。蜀中道士刘安胜又编撰《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首次明确尊奉张亚子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文昌神与梓潼神从此合二为一。文昌梓潼神祠庙也开始扎根于杭州西湖畔的吴山。《尧山堂外纪》载宋代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会试于行都，祈梦于吴山梓潼庙……是夜得吉梦，其年果及第”^⑨。真德秀是福建浦城人，于庆元五年（1199）进士及第。可见此时各地举子来杭州梓潼祠庙祭拜、祈梦以求登科已经蔚然成风。宋末元初的吴自牧《梦粱录》亦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⑩一些科举显达者也乐于为科举造神添砖加瓦，如宝祐元年（1253）状元姚勉的《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云：“科目之设，士散然日趋于文……矧梓潼神君庙食西蜀，启封王社，载在祠典，昭不可泯者哉，祠之者宜遍天下也，岂独奉化！”^⑪宝祐四年（1256）状元文天祥的《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也说：“今三岁大比，试者以文进。将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执其予夺于形声之表者，盖元皇是也……人谓选举之权属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⑫“元皇”指的就是梓潼帝君。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诏封梓潼神为“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这是皇帝第一次在敕封中把梓潼神与“文”联系在一起，肯定了民间信仰中梓潼神主宰科举文运的职能。原本只是偏远地方小神的梓潼帝君流寓杭州后荣陞为国家科举神。

到了明清时期，文昌梓潼帝君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人陆容《文昌道院记》载：“凡学宫之旁，皆肖而祀之，以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者宜如是也，牲帛相望，莫以为非。”^⑬文昌梓潼信仰十分盛行，其祠庙伴随孔庙、官学而遍及天下。受朝野崇拜文昌梓潼帝君风气的影响，明清小说也是津津乐道，常常让他现身弘法，惠泽举子。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描述了在江南贡院举行乡试祭神的情形，布政司的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举子出考场后，又要向文昌帝君祭献纸马。仪式隆重庄严，可见此神的崇高地位。其他如《巧联珠》《闹花丛》等诸多小说中，帝君常常现身举子的梦里宣示神谕，鼓舞士气，指点迷津，可见崇拜文昌帝君之风非常浓厚。

于谦：援关帝黜文昌与西湖小说的良苦用心

科举取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明显，在由朝廷统一主持的科举考试中，地域矛盾与论争历来不断。如从北宋的分路与凭才取人之争，明代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到清代分省录取进士，都是地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这种地域因素同样折射在科举神的流转沉浮当中。

梓潼帝君原本只是偏远蜀地的小神，最终在南宋的行都杭州升为国家的科举神，逐渐入主各地的贡院和民间祭祀。但这位流寓神在杭州的地位并不长久稳固，在明代被诞生在西湖畔的本土进士于谦取代。明清的杭州是首屈一指的科举胜地，《万历杭州府志》称“自（明）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里巷诗书，户不绝声”^⑭。据沈登苗先生统计，在明清进士最多的46个城市中，杭州以1039人位居第一^⑮。梓潼帝君来自偏远的蜀地，其原型张亚子是氏族人，且非科班出身的士子，此神已经难以匹配杭州的科举声誉，必须推举合适的新神取而代之。于是，本土进士于谦被请上了神坛。于谦（1398—1457），字廷益，杭州钱塘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勇破瓦剌，保卫北京。英宗复辟后，于谦被诬杀，与

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于谦在成为科举神的过程中，西湖小说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用心良苦地使用了援关帝、黜文昌的策略来扩大影响，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地域意识。

杭州举子向于谦祈求功名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钱塘县志》：“四方人祈梦以七宝山、三台山为九鲤湖。因试事祈者尤多。盖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谦都城隍也。周公寒铁之面，于公金石之心，故当不在九泉之下矣。”^⑥城隍被认为可以预测功名命运，并通过梦境告知世人，如宋代洪迈《夷坚甲志》卷九《邹益梦》，明代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十四《楚士胡士龙》，闵文振《涉异志》卷四十《徐贡魁入阴》等记举子向城隍祈求科举功名而灵验之事。据《万历钱塘县志》，于谦被塑造成科举神的关键一步是先成为城隍。但它没有说明于谦何时何以成为都城隍，也未交代此说的依据。目前，笔者尚未在明代的史志中找到相关记载。仅发现在一部重要志书《西湖游览志余》中有于谦死后托梦夫人借目伸冤之说：

少保公之既杀也，其夫人梦公谓曰：“吾被刑，魄虽殊，而魂不乱，独双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将见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丧明。已而奉天门灾，英庙临视，见少保公于火光中，隐隐闪闪也。时夫人方贬次山海关，复梦少保公曰：“吾已见形于皇帝矣，还汝目光。”^⑦

作者田汝成(1503—1557)，杭州钱塘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为人方正耿直，后罢官归里，盘桓湖山之间，遍览浙西名胜，以熟悉掌故轶闻著称。田汝成是于谦的钱塘老乡，且相去于谦的时代不久，《西湖游览志余》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对考察于谦的事迹传说具有重要价值。这则充满神异色彩的材料还没有于谦成为城隍之说。但流行于万历年间的一部西湖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三十二传叙说于谦被害之后：

公子于冕前一日已发辽东卫为军，不知父第二日被刑，与解人行至山海关，是夜梦父于公语曰：“吾前日已被石亨、徐有贞诬害而死。吾魄虽丧，而魂不灭。当日诉于天，蒙上帝怜吾忠义勤劳，着吾为京都城隍。吾今欲朝皇帝诉吾之冤，但借汝目光三日，现形朝见皇帝后，还汝目光。”……^⑧

此段主要采自《西湖游览志余》，两者的主干情节相同，都是于谦托梦远谪山海关的家人，要求借用眼睛去找皇帝辩冤，于是家人暂时失明，等到于谦伸冤后就复明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托梦给夫人，后者改成了托梦给儿子于冕。更重要的是在《于少保萃忠全传》中，于谦自称被上帝任命为京都城隍，交代了成为城隍的缘由、出处与时间。《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作者孙高亮是于谦的钱塘同乡，“约明万历初前后在世”^⑨。根据该小说第四十传中傅孟春的谕文和林从吾《序》，其成书于万历二十至三十年。这个故事还见于同时或稍前的另一版本《于少保萃忠传》(七十回本)第五十一回，文字大多相同^⑩。而《万历钱塘县志》修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于谦做了都城隍继而成为科举神之说应该是受到《于少保萃忠全传》《于少保萃忠传》的影响。

西湖小说不仅在于谦成为科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使用援关帝、黜文昌的策略来扩大于谦的影响力。关羽(?—220)，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三国时蜀汉名将，后世奉有汉寿亭侯、壮缪侯、武安王等多个尊号。众多行业奉关羽为神，就连举子也尊这位武将为掌取士大权的“文衡圣帝”。这种信仰尤其流行于科举繁盛、竞争激烈的江浙地区，如《崇祯嘉兴县志》卷六载，王三锡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撰《义勇武安王神祠碑记》记叙李叔承得到关羽的帮助而登第^⑪。《虎阜志》卷四载张国维因勤祀关帝而及第^⑫。《信义志》载魏尚贤应试万历壬午科，得关帝密语而登第^⑬。明末著名小说家宋懋澄曾作《祭武安王文》，祈求在关公的护佑下完成先父金榜题名的遗志，洗刷屡试不第的耻辱^⑭。关羽成为科举神迟于梓潼帝君而早于于谦，民间影响较大但缺乏官方在科举方面的封赐。西湖小说结盟出自北方的关帝来黜落西蜀的梓潼帝君，这一策略在《西湖佳话》《西湖二集》《醋葫芦》中多有施展。如《西湖佳话·三台梦迹》讲述了于谦在西湖向关帝祈问功名，关帝托梦让他询问自己的长嫂。长嫂笑答：“无非是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侍郎，做尚书、阁老罢了。你这天杀的，还想着要做到那里去?”^⑮祈梦关帝预示于谦的功名轨迹与命运结局，揭示了小说的情节走向和思想主题。于谦奉“正神”关帝为楷模，全篇以“正”字为核心和灵魂，“以此知西子湖灵秀之气中，有正气为之主宰，故为天下仰慕不已耳”。最终奠定了于谦作为科举神的显赫地位，“祈梦于祠下者，络绎不绝，祠侧遂造‘祈兆所’，彻夜灯烛，如同白昼。诚心拜祷，其梦无不显应”^⑯。《无声戏》第九回也说：“每到科

举年，他(于谦)的祠堂竟做了个大歇店。”⁹

《西湖佳话·三台梦迹》等西湖小说借早已盛名的关羽来神化抬高于谦，将其塑造成关羽的衣钵传人，而对早先在杭州成为国家科举神的梓潼帝君却只字未提。西湖小说即使写到此君也是多有不恭，甚至将其描述成失职渎职、名不副实的庸神。如《西湖二集》第十五卷的主人公罗隐，杭州府新城人，才华横溢，但这位“东南第一个才子”屡试不第。文昌帝君承诺“慢慢注汝之禄籍”，但他最终也仅做了钱塘县令，遗憾终身。而在《西湖二集》第四卷中，“恁般呆夯”“资性愚鲁”的温州人赵雄却一路连捷，文昌帝君甚至连金殿奏对都替他备好。小说在对本地人罗隐的深切同情中也委婉批评了文昌帝君罔顾公正、失职渎职。让此神最为尴尬、窘迫，并最终沦为不务正业的庸神，当属另一部西湖小说《醋葫芦》，其讲述商人成珪与妒妻都氏的家庭纠纷。在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中，文昌帝君居然登场。在第十六回中，都氏妒气炽烈，黑气冲天，威逼帝座。玉帝传旨道：“快宣文昌星，代朕看来，果系是何妖孽，的确奏闻。”天庭急警，却命掌管文运禄籍的文昌帝君出面调查，所任非职，严重错位，在明清小说中实属罕见。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文昌帝君对妒妇泼悍的分析与“因宜急剿，以苏群黎”的建议，故作堂皇的说辞背后透出诙谐嘲弄之意，大大消解了文昌帝君的尊贵形象。

“西湖得人而显”：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

为了避免当前文学地理研究中的泛论现象，本文花了较大篇幅来梳理科举神在西湖畔的流转沉浮，从一个富有地域特色的科举风俗的变迁视角来认识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其主要有：

1. 地域文献价值。学界认为地域色彩鲜明的小说文献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古代小说领域的文学地理研究，而西湖小说能弥补这一缺憾，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小说文献。

西湖小说具有强烈、自觉的地域意识，其煞费苦心地虚构于谦的城隍身份，而对被明成祖敕封为城隍的周新视而不见¹⁰，尽管他曾任浙江按察使，以“寒铁之面”名扬天下。原因在于周新是广东人，仅为诸生。而于谦是西湖之子，进士及第，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著名八股文选家俞长城在《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中将其冠于明文之首，称“立德立言，允文允武，旷世合辙，余故以文山殿宋，以忠肃冠明，比而录之，谅九原亦为称快尔”¹¹，将文天祥视为宋文的终结，将于谦奉为明代八股文的开创者。王汝骥称赞于谦“于制义之体，可谓初之初者矣。其气之奇、才之横、法之密至于此，可见此道开宗嫡传，如是如是。”王步青也称于谦的八股文“体大思精，光焰万丈，以此制义开宗，岂在班马欧韩之下？”¹²他们都认为于谦的制艺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于谦的制艺也常常入选后世的八股文选本，被考生奉为圭臬。而杭州是八股文选本的发源地和编刊中心，明代郎瑛记载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¹³杭州通判沈澄刊刻的《京华日抄》开创了八股文选刊本风行科场的时代。清代赵翼记载说：“每科房考之刻，皆出于苏杭，而北方贾人市买以去，天下群奉为的矣。”¹⁴因此，西湖小说没有考虑周新被敕封城隍的史实，虚构城隍身份，最终将“土著人”于谦取代“流寓神”梓潼帝君，并非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而是深厚的乡邦文化的自豪感和强烈的地域意识使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湖上活跃着一个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家群。笔者初步统计了明末清初以“西湖”为名号、与小说有关者有26人的29个名号¹⁵。他们应该具有相同相近的生活经历与兴趣爱好，或是挚友，或是同乡，常在西湖上悠游挥毫，正如湖海士的《西湖二集序》所说：“水光盈眸，山色接牖……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¹⁶他们也常会在聚会上一一起切磋交流。美丽的湖光山色、动人的胜迹传说与深厚的西湖文化都会反映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于是西湖故事信笔拈来，西湖小说应运而生，表现出小说家们对地域文化的强烈认同，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

尽管最早提出“西湖小说”的《北游录》的抄本流传不广，“西湖小说”长久没有引起关注，但自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唐代袁郊的《甘泽谣》，到吴蒙于1907年发表的《学究新谈》，西湖小说的创作一直生生不息。尤其是宋元的《西湖三塔记》《夷坚志·西湖女子》，还有明清的《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等，在命名上明确标识“西湖”，以浓郁的地

域色彩在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极佳的样本。杭州还是古代小说刊刻中心之一，编刊的西湖小说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论《于少保萃忠全传》在明清多次梓行，存世有万历刊本、天启刻本、康熙精刊本、宝翰楼本、本衙藏本、裕德堂本、三让堂本等十多种版本，另有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的双璧堂刊本，可见其非常畅销，流布甚广。《西湖佳话》传至日本，在1804年出现了日文刊本《通俗西湖佳话》。《西湖二集》也是“明刊行后流传甚广”^①。因此，西湖小说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小说文献。

2. 研究方法价值。当前文学地理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忽视文学对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影响了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而西湖小说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它具有强烈、自觉的文学地理观念。《西湖佳话序》云：“随在即是诗题，触处尽成佳话，故笔不梦而花，法不说而雨。自李邕侯、白香山而后，骚人巨卿之品题日广，山水之色泽日妍；西湖得人而显，人亦因西湖以传。”^②此处的“人”更多是指诗人及文学家，西湖小说家强调“诗题”成就了佳话，名篇佳作作为西湖增光添彩，甚至创造、重塑了西湖的文化胜迹。英国当代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③可见西湖小说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当代的文学地理观念。前文论述西湖小说在重塑科举神的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改变和创造了西湖畔的科举祈梦风俗及其胜迹，为文学地理研究的方法提供了深刻启示。西湖小说不仅全面反映与生动阐释了“湖山一城市”的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而且自觉参与营造和积极深化这些因素，从而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和研究典范。

3. 景观研究价值。“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并日益成为新的研究中心和重心，代表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④。西湖景观秀绝天下，《西湖二集序》开篇就自豪地宣称：“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⑤“西湖”不仅是西湖小说的名片和标志，而且是它的灵魂内核与精神符号。R. J. 约翰斯顿指出：“实际上，所有的景观都变为文化景观。”^⑥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在于它不仅描绘了秀丽曼妙的湖光山色，而且将其建构成叙事场景，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生动展现自然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的鲜明轨迹，并深入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这是诗文词赋等文体所不可比拟的。《西湖佳话》云：“景物因人成胜概。”其中十六篇小说的题目如《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等，都是西湖景观加文化内涵的核心词构成，再通过葛洪、白居易、苏轼、骆宾王、林逋、于谦等十六人的故事，来展示这些名胜景观形成的地理条件、文化因素以及前世今生的演变历程。前文所论《三台梦迹》等西湖小说着力展现于谦成神的历程，“以此知西子湖灵秀之气中，有正气为之主宰，故为天下仰慕不已耳”，来揭示三台山成为名胜景观的文化动因和变化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景观在不同时代被不断地改写、重塑，最终累积沉淀下来，形成了层理丰富多彩且清晰共存的层累构造。如《灵隐诗迹》《三台梦迹》等篇章中，我们可以析出神话传说中的“梦幻”景观、历史故实中的“史笔”景观、小说人物所见的“画意”景观、小说所引诗词描绘的“诗情”景观、小说作者描绘的实际景观等多重层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自然和人文沉淀的理路，虚拟景观(内部文学景观)和实体景观(外部文学景观)的结合与转换等诸多有价值的问题。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84—87页。

②曾大兴：《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③李小贝：《明清小说中的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④谈迁：《北游录》第三卷《纪邮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65页。

⑤如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胡海义《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

2 期)等等。

⑥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72 页。

⑦祝尚书：《科举守护神“文昌梓潼帝君”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年第 5 期。

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3462 页。

⑨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续修四库全书》第 119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60 页。

⑩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四《外郡行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31 页。

⑪姚勉：《雪坡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87 页。

⑫文天祥：《文山集》卷十二，同上书，第 576 页。

⑬黄宗羲：《明文海》卷三六九，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802 页。

⑭彭泽等：《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学生书局，1965 年，第 344 页。

⑮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冬之卷。

⑯聂心汤、虞淳熙：《万历钱塘县志》，《丛书集成续编》第 231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 年，第 423 页。

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51 页。

⑱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65 页。

⑲刘世德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第 705 页。

⑳沈士俨：《于少保萃忠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58—259 页。

㉑罗炯、黄承昊：《崇祯嘉兴县志》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235—236 页。

㉒陆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卷四，古吴轩出版社，1995 年，第 58 页。

㉓陈至言、周弈飏：《昆山信义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5 页。

㉔宋懋澄：《九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90 页。

㉕㉖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46、163 页。

㉗李渔：《无声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50 页。

-
- ⑳ 郎瑛：《七修类稿续稿》，《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423 页。
- ㉑ 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于廷益稿》卷首题识，乾隆三年文盛堂与怀德堂合印本。
- ㉒ 《明文钞》三编“化治文”，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 ㉓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辨证类》，上海书店，2001 年，第 259 页。
- ㉔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三《刻时文》，中华书局，1963 年，第 696 页。
- ㉕ 胡海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52 页。
- ㉖ 湖海士：《西湖二集序》，《西湖二集》卷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 页。
- ㉗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年，第 276 页。
- ㉘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年。
- ㉙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0 页。
- ㉚ 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研究》2012 年总第 12 辑。
- ㉛ 湖海士：《西湖二集序》，《西湖二集》卷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 页。
- ㉜ [美] R. 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367—368 页。